



ZHONGHUA

ZHENGZHIIJAMOUULUEKU

中华政治家 谋略库

● 主编 / 陈哲夫 孙乃民 尚正明 张湛彬
■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谋略库

主编 陈哲夫 孙乃民 尚正明 张湛彬

中国物价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超平

中华政治家谋略库

主 编

陈智夫 孙乃民 尚正明 张湛彬

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98.75印张 2600千字 6插图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7-80070-582-X/F·437

定价：298.00元

授人以智
成功有道

楊成武



一九六九年五月

《中华政治家谋略库》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赵宝煦 吴 枫 张云樵 王振科

主 编

陈哲夫 孙乃民 尚正明 张湛彬

执行主编

郑 毅 卞直甫 岳庆平 林 乾

副 主 编

王延中 衣兴国 刁书仁 雷 庆
句 华 孔艳春 姜 宏

编 委

赵兴元 陈见微 林敦明 田 波
唐学仁 王 虹 孔艳春 冯宝安
蒙秉书 杨占茹 关大虹 孙玉民
惠连江 缪晓敏 李 冬 徐展鹏

编 撰 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刁书仁 万 群 于红军
王 平 王 丽 王 虹 王 军
王延中 王育英 王永萍 王建勋
王海燕 王云德 王俊霞 王德玉
孔令伟 孔艳波 孔艳春 牛兰春

马卞句孙林刘全李李宋郑张周邹赵侯徐梁黄高惠	虹甫华丽乾涌迷敏冬华毅良鹏平田飞鹏海伟芳江	培波文民明毅国小白华夫波樵明有伟铭中仕红书敏	德占乃敦兴小丽哲云正本姜殷林唐黄蒙缪	马田史孙林刘衣李许陈张尚宫姜	历田孙孙刘关李李许陈张周杨赵姜殷钱唐崔雷	景静书玉明利平阳强微莉旭志宝宏伟平龙京庆	辉姝校民一平平文见东军煦宏伟平龙京庆	卞申孙冯刘关李李曲吴张周杨赵侯徐梁黄高都	地虹莹宝德大虹钢英平畏彬帆茹元玲蒙胜公山峰	诗虹莹宝德大虹钢英平畏彬帆茹元玲蒙胜公山峰
-----------------------	-----------------------	------------------------	--------------------	----------------	----------------------	----------------------	--------------------	----------------------	-----------------------	-----------------------

编者说明

一、本书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家谋略事典”，收录了自商以来历代谋略事典 2000 余条，共分为 29 个分章节，全部白话今译或评述；

第二部分“政治家谋略名著精粹”，精选了中华书海宝库中有关论述谋略的名著国粹 28 部，并附译文；

第三部分“政治家谋略名篇精选”，选编了历代有关论述谋略的佳作 54 篇，并附译文；

第四部分“政治家谋略著作题解”，对第二、第三部分没有选入而又可读性较强的 88 部作品，作了详细、全面的介绍与提示，以便读者全面接触了解中国谋略典籍，方便阅读。

二、本书选用的史料主要依据正史，亦不舍弃稗官野史中少量有价值的材料，以补缺漏。

三、本书选用的古文典籍大多是权威的版本。原著质量较高。

四、本书译文以直译为主，亦讲文采，力求信、达、雅。

五、第一部分的《奸诈权谋篇》、《夺权政变篇》和《昏愎暴虐篇》，是考虑到历史的全貌、为剖析和暴露阴谋家的鄙劣手段而编入的，阅读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鉴别，用批判的眼光去认识、把握。

前言

一、中华政治权谋的理论起源

权谋,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自古迄今论及此题者甚多,有专论“谋略”者,有深究“韬略”者,有研讨“智谋”者,其要旨皆在论述智谋韬略对于社会发展之作用。从广义而言,“权谋”与“谋略”、“韬略”、“智谋”互有交叉,为人类社会智慧之弥珍结晶。从政有“政鉴”,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的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也就是政治家的谋略;治军有“兵法”,兵法既是过去战争的总结,又为后来的军事家提供了良谋,兵法就是军事谋略。治学要得法,经营要有术,为人处事要得体,要有谋。这一切又都与权谋有密切关系。在适用范围的层次上看,有个人之谋和企业之谋、国家之谋和世界之谋等等。前者如个人成功要诀、企业经营战略,后者如治国方略、“星球大战”计划等。这一切谋略尤其是后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和智慧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适应自然、适应社会并运用不断发达的思维主动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与改造自身的结果。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历史发展到“文明史”的阶段。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权谋作为人们不断征服自然、发展自身的成果和手段,在人类文明史上无疑占有相当的份量。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把人类的文明史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几千年拓展到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以石块、木棒为武器与猛兽搏斗;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连结成氏族公社、农村公社,依靠集体的力量与恶劣的大自然抗争;从利用野火到钻木取火,直至发展原始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等,无疑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反映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这一切都说明,人类权谋思维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如果继续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向前推,我们会发现许多有生命的动物,都有自我保护、繁衍生息的本领。原始的生命具有一些低级的生存反应,遇到食物就趋近,遇到危险就回避。岩鸽与老鹰的巧妙搏斗,狐狸猎捕天鹅、躲避猎手捕杀的计谋,都反映了这些动物的生存谋略。由于这种生存谋略来源于其生存本能,亦被称为“本能谋略”。有生命就有反应和思维,有思维就产生了智谋。生命之源就诞生了智谋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人类文明史之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基本特征的“本能谋略”形式。随着人类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大脑思维能力的增强和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智谋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经验智慧的结晶和浓缩,成为人类改变自然、改造社会和自身的手段,成为人类文明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标志与象征。

权谋的起源早于文字的发明和文献记载之前,但文字记载却使权谋的起源研究成为可能。台湾学者曹中元在其《军事谋略学》中认为,“谋略二字单独解释,虽有多方面的意义,但由古书

中寻求其源出,谋字实寓有欺骗,略字乃为计划事物之方策、方案、方法之谓。将谋略二字相连用者,汉代以前未之见载;而始于《三国志》。《三国志》魏书程昱郭嘉等传评:‘才策谋略,世之奇世’。吴书陆逊传评:‘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为称赞军事人才之创用名词。考程昱郭嘉与陆逊皆以出奇计欺敌著名。故谋略谓将领作战之艺术,自属适宜。”曹先生之意,军事谋略自“三国”始。与曹先生不同,大陆学者李炳彦、孙兢等认为中国的军事谋略始自《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以说篇篇都贯穿着谋略思想。”如“始计篇”的“三十诡道”,“势篇”的“奇正相变”以及“攻其必救”、“以迂为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不仅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权谋思想,而且体现了那一时期的一些重要谋略原则。^①以《谋略论》等而蜚声军内外的柴宇球等学者,仔细考证了“谋”与“略”的历史源头。他认为在文字的形成上,“谋”的问世早于“略”约千余年。《尚书》中的《皋陶谟》,书中记载皋陶、夏禹、虞舜讨论和谋划政事都称“谋”。早在4000多年前的《书经·大禹谟》中写道:“询谋金同”,“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议确定计谋,未经过大家商量讨论的计谋不能轻易使用。在《尚书·武成》中,“略”字亦有谋略之义,《葛子·王霸》中“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已经将略作为谋略之义在应用了。把“谋”与“略”连起来使用,早期见于《六韬》,书中写道:“无智略计谋”;《淮南子·兵略训》中写道:“兵,止也。防敌之萌,皆在谋略。”在这里,“谋略”之产生,显然早于《三国志》和《孙子兵法》。

权谋,到底源于何时?如果把权谋用作动词,指人们事先的筹划活动即思维主体运用知识、智慧和能力进行思考运筹的过程,显然要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之前。如果把谋略作为人类智慧经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象征,即运用文字来记载和研讨人类思维积极活动的结果,它应产生于文字诞生之后,并被一批掌握文字的阶层所熟练运用之时。这里我们显然更偏重后一层意思。上文曹先生认为军事权谋产生于《三国志》,显然忽视了《三国志》成书之前中国人丰富的权谋实践与大批智谋著作了。柴先生把谋略理论的产生推广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初,有其道理,但却忽视了以智慧为生存之本的大量谋士在发展谋略学中的突出作用。李先生以《孙子兵法》为东方兵学谋权鼻祖,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在中华权谋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却相对忽视了与孙子同时代的大批其它权谋著作。我们认为,中华权谋理论源于五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有智有谋的谋士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他们或者效命于宫廷朝中,执掌军国大权;或者游说于天子诸侯,以实现其抱负与理想;或者纵横捭阖于各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活跃于外交舞台上;或者理财致富,富比王侯。

二、中华政治权谋理论的形成

诸子百家之术,纷纷攘攘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虽然各自的主张与见解不同,但

^① 参见李炳彦、孙兢著:《军事谋略学》(上)第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它们却有一共同之处,即希望自己的主张被开明的君主采用,行之于朝,布之于野,为治国安邦服务,并依靠政治力量使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成为“显学”。一时间,诸子登场,学派林立,良谋诡道,论辩不休。在这场争论中,真正被统治者所采纳利用的,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前三家成为安邦治国的统治权谋,兵家成为治军平乱的军事权谋理论的百世经典。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大思想派系,其权谋思想一直是古代中国智慧的核心。儒家形成于周朝,集大成于孔孟,代表人物有周公、孔子、孟子、子思、荀子等。从萌芽状态的周公制礼作乐、仁政治国到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性善论、养气说、仁政王道思想,使儒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显学”。从荀子起,儒家又把自己的仁学与法家的法治理论相结合,在《易传》、《中庸》等著作中建立起天道、人道、人心于一体的宇宙系统论,形成了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兼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权谋智慧体系。

在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子那里,儒学主要不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一些具体的统治术,而是提供长久统治的基本原则与准绳。比如他提出的“正名”原则,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前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主张以正名分的形式,把社会秩序重新规定一番,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正名分,把社会严格划分成一个个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的人要各守自己的本份,不守本份将受到谴责或制裁。这样就使传统等级秩序得到维护,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石和法宝。从“正名”开始,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和大同思想,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主要方法策略,以大同为目标的思想权谋体系。孔子的“仁”涵义宽泛,几乎包括了孝、亲、忠、恕、礼、智、勇、恭、宽、敏、惠、悌等内容。其中“尊尊、亲亲”是其核心。以“亲”治维护社会的血统关系,使各宗族之“亲”为长幼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服务;以“忠”来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使等级秩序万世不可动摇;通过“尊尊、亲亲”使家庭、宗族组织成为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的臻密罗网,实现等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仁”政的表现形式是“礼”,以“礼”治收归人心,甘愿服从等级统治。仁政的实施策略是“中”和“庸”。中庸的含义是指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和方法,尽量不走极端,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治稳定。孔子以后,历代儒家又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对儒家学说进行补充和完善,终于使它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立政安邦、固本求治的政治权谋的核心。

道家与儒家一样,是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代表人物是关尹、庄周、彭蒙、田骈等。道家的基本思想的主要体现在《老子》、《庄子》等典籍中。道家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虚幻无形的道为本源,以道的永恒的循环往复为谋事立身的运用。即“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通过“道”的变化,老子等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相互依存而不是相互孤立的相辅相成关系,如长短、强弱、刚柔、祸福等。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通过认识这种相辅相成的事物对立与转化规律,老子运用到解释自然、治国安邦、施智用谋的各个方面,成为统治者统御权谋的大成。

对道的认识,决定了道家的权谋运用。由于“道”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永恒运动,凡事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所以道家在权谋上十分强调以柔克刚和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以柔克刚”是老子谋略思想的核心。“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意指事物强大了,社会衰老,有意促成事物强大,违反了道的规律,就会促使其早日灭亡。通过对“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之理的阐述,老子指出国君要通晓这一道理,作为掌握政要的韬略和统御之术。所谓“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从顺应自然出发，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他认为，要成大事，必须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施智用谋的上策是给对方以无为、无知、无能印象，处处以受治于人的面目出现，达到有为而治，处处治人之目的。老子统御术的第三个策略“非智”、“愚民”，使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越少越好，头脑越简单越好，使其安分守己，便于统治。老子这一愚民统治论，被几千年的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其巩固统治的工具。

法家是起源于先秦，集大成于韩非子的一个重要流派，以管仲、子产、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为代表。作为稍晚于儒、道等学派而形成的一个主要思想流派，法家思想表现为一个前承后续、发展壮大的权谋体系。其基本性质是治国为君之谋，权谋核心在于讲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法”即成文之法，通过公布法律条令，晓喻于全体民众，作为社会秩序与进行统治的依据。“术”即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为君主所独有。“势”即国君的威势，即其政权力量。法为治国之本，术为运事之谋，势为成事之威。三者结合，成为法家权谋的核心：抱法守术处势，即凭借君主和政权威势制定并推行各类刑律法令，并以各种手段统治制服臣民。法家权谋，适应了国家统一时期建立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成为巩固君主地位、建立大一统统治的中心谋略。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成为贯彻法家思想最彻底的国家，并取得了建立专制君主统治和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秦国在推行法家谋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实施“法、术、势”，建立法制，实施中央集权，以政治权力的大小划分等级代替过去以宗法血缘亲疏高低划分等级的办法，采取弱枝强干政策，高扬君权。去仁弃义，唯法是从；治国以严刑为主，佐以赏赐，严刑以慑众，诛暴以禁乱；行法不避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任人尚法不尚贤。暗施权术，使用诈谋诡计达到统治目的。设连坐保甲，制吏缚民。第二，禁心钳心，实施严密的思想统治甚至不惜以暴力来弘扬一家之言，废百家之说。“焚书”、“坑儒”、“禁和学”是其中著名的措施。第三，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法家视农为本，余皆末业，采取种种措施发展农业，抑商助农。通过注重农耕，发展经济，达到富国强兵和霸天下之目的。法家学说与权谋大多切于世用，当时诸侯国多所采用。汉代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仍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兼行的策略。

兵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流派，以军事理论与实践为专门研究对象，使我国的军画谋略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就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学著作所提出的军事理论与谋略，直到今天仍为世人所推崇，不断地研究和应用。兵家的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臆、吴起等，最著名的是孙武。

孙子作为我国古代兵学的集大成者和大军事家、大权谋家，在其不朽名著《孙子兵法》中，揭示了军事权谋的本质特征是“诡道”和“用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欺骗。在《孙子》开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亦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休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诡道”和“用诈”是一切权谋理论之基础，指出了权谋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成为指导谋权实践的金钥匙。在《孙子》中，还论述了数以百计的权谋方法，如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知己知彼等等，成为后世军事实践的借鉴和指南。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权谋经典，而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权谋学大全。军事家可以用之行军作战，政治家可以借此治国，所谓“国无兵不安”，“兵者，国之大事，死亡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治国要先谋兵,这是治国的基本方略。外交家可以从中领悟和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在伐交伐谋中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果。《孙子》中的许多哲学思想,成为哲学研读的重点,而企业家则从治国将兵中学习企业经营用人之道,在“经济战”、“商战”中取得成功。由此可见,把军事谋略学的基本原则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权谋思想用来指导实践,就能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这一思想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智慧发展史上,处于当之无愧的巅峰位置,直到今天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革十分剧烈的时期。列强争雄,诸子争鸣,各种学说流派林立,权谋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和体现,奠定了后世中华权谋理论的基础。上述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是其骨干,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成为中华权谋理论宝库中十分耀眼的明珠。秦汉以后,佛学的传入与兴起,使中华权谋理论中增添了个人生存谋略的内容。通过修入禅,佛学理论对芸芸众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大一统的专制体制下,各流派和权谋的哲学思潮日趋合流,互相渗透,杂揉一起,形成了以儒学为框架,儒法释道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谋略思想。这种权谋的重点是政略,以安邦治国平天下为重点,兵家谋略渐渐势微,直到现代谋略学产生前,都没有超过《孙子兵法》曾经达到的水平和高度。

三、中华政治权谋的主要特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政治权谋理论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一)政略优先

政治需要是中华权谋产生的重要原因,不论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以为政治服务为特征的。在传统权谋思想中,政治权谋居于第一位。儒家的仁政、民为本说,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法家以“法”、“术”、“势”为专制君主提供长治久安的政治权谋与统御之术。就是我国兵学的集大成者孙武,也继承了为君主服务的治国御众权谋,与老聃、孔子在思想上有许多相通或相似之处。

政治权谋主要通过君主和谋士来运用和实施。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君主权谋具有主以性和非程序性;谋士的权谋具有依附性和非独立性。君主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既要利用谋士出谋划策,又要自己做出决定。由于政事众多,君主不可能在做出决定时进行充分论证,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处理每一件事情。同时,由于君权至上,他不仅使谋士服从自己的意志,谋士的权谋只能成为自己意志的反映,而且由于没有对君主决策的监督校正机制,君主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往往成为权谋实施的决定因素。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的权谋,有些是十分开明的,这有助于自己江山的建立和政权的稳定。而有一些昏君,才识短浅,胸无良谋却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强制

实施败国败事之谋,结果是江山易主,自己灭亡。君主权谋虽具有主观随意性和非程序性,但却要使权谋服务于夺取江山或维持政权这一根本目的。

与君主权谋的主观随意性和非程序性相比,谋士的权谋具有依附性和非独立性的特征。在专制制度下,谋士是以自己的智力活动为主人出谋献策服务的。谋士被主人利用和豢养,依附主人生,当然要听主人的话,看主人的脸色行事,揣摩主人的意图,投其所好,在权谋中必须贯彻主人的意志,常常无自己的独立意志。虽然谋士可以对主人决策施加影响,并采取种种方法创造使主人接受自己权谋的有利环境和氛围,但权谋能否实施完全取决于主人。无论多么高明的权谋,君主不采用也只能束之高阁,失去其时代价值。

(二)重视军事

军事权谋是中华政治权谋产生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当今谋略学研究的重点。不同民族的军事理论,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印记。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军事对抗中更注意权谋,西方人更注意技术。《孙子》中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把用谋放在军事活动的首位,这是中华军事权谋理论的突出特点。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华军事权谋理论,上承伊尹、姜尚、管仲等权谋家用兵制胜之策,同时吸收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权谋思想和军事原则,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虚实、奇正、治乱、动静、勇怯、胜败等诸多方面的辩证论述,反映了从《易经》和老子哲学吸收以易演兵的思维轨迹。《孙子》中提出的以“能而示之不能”的权诈之术和天地可知、天时地利可用,规律可被认识、鬼神不足信等观点,也反映出中国兵学重人事、重权谋的特点。同时,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儒家历来重仕途轻技艺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儒家文化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把科学文化知识视为做官的手段,视技术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反映在军事理论上,就是不注意对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14世纪传到西方。直到西方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在军事中的作用,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科学技术在军事对抗中的作用不被重视,以谋制胜,成了军事权谋理论家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军事理论,也沿着这条重权谋的道路走了两千多年,都没有超出《孙子兵法》所达到的高度。

(三)伦理本位

中华政治权谋特别强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权谋与技巧。注重人际关系,并带有强烈的伦理化特色,是由于人们长期囿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环境,不注重发展经济,过分强调伦理政治造成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仅权谋观念带有伦理道理色彩,而且整个文化系统也以伦理、政治为核心。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统治者大谈“仁道”,注重道德感化,以伦理的训条而不是以法律规范治理国事,协调等级差别,维持贵贱不相逾越。一般民众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在观念文化方面,许多哲学、政治、道德、审美等观念的产生,都以体现伦理规范的“礼”为轴心。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过分强

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天人合一”，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和分裂。各种权谋之术大多局限于人际关系方面，尤其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王道”、“霸道”方法，驾御群臣的控制术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征。

(四)中庸之道

“中庸”即以中为用，用中和之道以处事，“执事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权谋的重要特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强调中庸，这是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规范。《论语·雍也》中写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程颐注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天地、阴阳、刚柔、上下的对峙两端，都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刚，补彼之柔，在彼此的融合中求得最佳的“中庸”效果。譬如“宽猛相济”、“德形相补”等。这种最佳“中”的效果，便是无过，过则超过一定的度，破坏稳定性而向反面转变；是无不及，不及是没有达到一定的界限，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只有无过无不及，才能保持稳定，长治久安。

这种中庸权谋的第一个特征是求稳、求全，不愿冒险，害怕失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穷寇勿追”，“落水狗勿打”，虽然其中包含着辩证思想的法则，但以此作为权谋的指导思想则说明“胜不可走极端”的中庸思想，有时也丧失了求全胜、大胜的机会，甚至会给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

中庸权谋的第二个特征是凡事都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发制人”，“求胜者先虑败”为权谋的出发点，凡事求两全，尽可能周到地思考问题，得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在中国的权谋史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上、中、下三策或称上、中、下三计，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中庸权谋的特征。

(五)悟高于谋

此处的“悟”指的是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中国的传统权谋流派无不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之下，为阐发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而提出种种具体权谋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从总的方法论上说，权谋都是建立在这种深刻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哲学与政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还是法家的“法”、“术”、“势”，抑或道家的“道”、“无为”，既是哲学的概念，也是伦理学概念，同时也是政治学概念，而上述种种权谋思想，均是这样一些对于整体世界的思考的结果。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所谓的“谋”与“略”就是呼之欲出，自然而然的事了。举个例子，法家既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自然要对“恶”加以抑制，自然要强调严刑峻法，所谓“法者，王之本也。”

反过来看，凡是没有自身完善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权谋，都只能是一家之言，不能在中华权谋体系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除儒、法、道家外，其余各家都只是某个方面的权谋，成独行于一隅，或依附于某个大家，或融会某个大家的思想，方能施行一时或一隅。

(六)攻心为上

中华权谋中,有大量的攻心战的例子,儒家思想中的“仁”、“礼”、“信”等原则,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都是论述为事必后于人心本于人情的基本原则。把人事之谋,为事成事的根据建立在人情自愿的基础上,不是片面、外在地以利害挟中持人,以强为胁迫人,以计谋算计人,而是以情动人,使人感动,感激,或是感到震慑,受到感召而为之。

这种攻心为上的权谋特征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阐发,空城计历史上是没有的,楚汉之争的“四面楚歌”、战国时齐将田忌变灶惑敌,种种心战实例,数不胜数,均是这种攻心为上的权谋的例子。

四、中华政治权谋的层次

中华政治权谋理论有一个逐步深化、完善系统的发展历程。

(一)权谋的哲学层次——“为谋之谋”

内在的权谋智慧即权谋的思想基础,它是智慧或称“智慧哲学”,而不是计谋,它是制订权谋的根据和准则。正因如此,它是为谋之母。

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还是后来兴起的佛家,均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于天地大道,治国伟策,身心本性的总的指导原则。儒家有“仁”、“义”、“礼”、“智”、“信”、“统”概念;法家有“法”、“术”、“势”以及荀子提出的“礼”、“法”结合的思想,道家的对立一的朴素的辩证观点;后来的佛家“定”与“慧”、“净”与“悟”等,以及其它思想流派,均是这样的思想哲学和人生智慧,是各种具体权谋的思想基础,是“为谋之谋”。

数千年来,中华政治权谋智慧一直处于冲突与交融并存的状态,特别是秦汉以后,各种流派和权谋的哲学思想日趋合流,互相渗透,杂揉一起,形成以儒家为形式的框架,儒法道释四家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权谋思想和智慧。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这些思想智慧中,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消极避世的一面,有维护封建正统的保守思想,也有革除旧弊的革新思想,既有对世界的朴素客观的认识,也有荒诞不经的异端邪说,我们应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

(二)权谋的理论层次——具体的权谋思想

具体的权谋思想可以说是在内在权谋智慧的指导下,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实践其思想原则的权谋体系。具体说来,它是一个多方位、系统化的谋划体系。

诸子中,儒家的权谋思想建立在儒家哲学的核心——“仁”学结构上,其治国的出发点是“为政在人”,强调以礼规范人的道德,以任贤才、施仁政来争取民心,以每一个人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在处世方面,儒家强调“伦理”,“三纲五常”,“克己复礼”。在谋事上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在个人修养方面,强调遵循礼仪,培养道德人格为解决身心问题、外在事功、齐家交友以及进而治国平天下或达臻圣人的境界。

法家则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在治国上强调“严刑峻法”,严刑以慑众,诛暴以禁乱;行法不避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韩非在《有度》篇中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新加,智者弗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然法家以“刑”为主,“赏”不过是为了使“刑”更具威慑力而已。所以,有人说:“法家严而少恩。”

法家的具体权谋体系中还包括禁心钳口的“壹言”之谋,即加强政治控制的权谋、富国强兵、称王立霸的耕战之谋,如抑商助农、独贵农耕等。

法家思想产生于战国纷起的时代,直接为统治者施行统治提供权谋,故其重点在于为政治国之谋。

道家则在“贵柔”、“无为”这两大基本权谋原则指导下,将“道”的思想贯彻于治国、处世诸方面,因此,道家的治国之谋是“无为而治”,是“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用之”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政谋。在处世上,则推崇“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不争之德”。在策略上则强调辩证统一,反而正之,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最高境界。

佛家则是在人生智慧上有其独特的具体权谋思想。佛家通过止息散心,专注一境,观想智慧,通过自身的“净”,即去掉一切世事烦扰,不执著于万事万物,保持内在神明的清静平和之本,以达到“悟”的境界,达到霎那间悟解人生万有之真谛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来说,佛家是关于人生智慧的具体权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道家有某些相似之处。

儒家道释为代表的传统权谋具体思想体现在:(1)为政之谋,政治上的强大凝聚力;(2)济世之谋,经济上巨大的生产力;(3)用兵之谋,军事上无形的战斗力;(4)外交之谋,交往中灵活的应变力;(5)治国之谋,驭民时稳定的控制力;(6)修身之谋,自省中的启发力;(7)断讼之谋,决案中的分辨力。凡此种种,各尽其能,瑕瑜互见,构成权谋的理论层次。

(三)权谋的经验层次——权谋之策

这是权谋最外在的形式,诸子百家中的兵家、墨家、农家、阴阳家等等在这一领域中大显身手,大放异彩。“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千百奇谋”,大千世界古往今来,有人的地方,必有人权谋之策。从《孙子兵法》到《资政新篇》,从田单攻燕到兴兵北伐,从《隆中对》到《治平胜算全书》,从姜子牙到牛金星,无论是人、事、书,还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华传统权谋哲学和具体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和磨砺,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大地上,五千年来

不知上演了多少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话剧,涌现了多少足智多谋、举世闻名的英雄贤者,留下了多少博大精深的典籍。人以事传,智以人传,主角是人,核心是谋,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人中,有的是赫赫有名开国创业的明帝贤君,有的是治国安邦的良相谋臣,有的是驰骋沙场、计谋泉涌的武将,有的是某一重要人物的门人策士,有的是纵横卑阖的外交家,有的是农民起义的“智多星”,有的是断案决讼的“清官”,有的是经营有方的经济学家,有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百姓。他们留下的经验与典籍,记录了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舞台上,面对波诡云谲、危机四伏而又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能够扭危局,胜险恶,沉着应变,机敏而动,用其谋治国则能从崎岖而致坦途,作战则能克敌而致胜,理财则能兴国而富民,出使则能谈笑间策定乾坤,处世则能高屋建瓴而从容自若。

这一层次的权谋多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计谋,如孙武的《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在具体的战法上极尽算计之能事;而前面我们曾经谈到,法家的权谋思想中也有强兵立霸之谋,但法家兵战的最高权谋是功夫在“战”外。不战而胜人之兵,不动干戈而得兵战之利,即兵战“本于政胜”。二者的不同就在于此。而且这种不同实际上就是权谋的层次的不同,法家的强兵之谋是一种权谋思想,兵家的“兵法”则是一种智谋、计谋。最著名的“三十六计”,则是这种具体权谋的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其余的如墨家的论辩术,纵横家的连横合纵之计,阴阳家的以天象占卜吉凶之术等等。

可以说,“为谋之谋”是智慧的灵魂,权谋的理论原则是权谋的骨骼,而具体的计策(权谋之策)则是权谋的血肉,三者缺一不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是它的“血肉”,耳闻目睹,交口相传。而最容易忽视的则是它的哲学思想,这恰恰是权谋的关键所在,源泉所在。

五、中华政治权谋学的诞生

(一)中华传统政治权谋的缺陷

中华民族是善于用智用谋的民族,但因历史的局限性,在其权谋之光大放异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是决策的随意性。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集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朕即法”,既能制定法律,也能随时改变法律。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决策体制与决策意识具有很强的人治特点。人在政兴,人亡政息。各种决策随着王朝的更替,皇帝的轮换而动摇不定,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决策的个人意志和随机性很难保证决策上升为理性和科学。二是决策的经验性。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交往狭窄,社会变迁缓慢,谁的年龄长、地位高就比一般人多掌握了不少信息和经验,这种信息和经验成为他们判断事物、决胜千里的依据。在这里,理性的分析少,对实施权谋的具体操作程序分